

吕思勉与中国通史编撰

李 波

摘 要:20 世纪初新旧史学转型以来,史学风尚偏向从专研究发展,而吕思勉重视通史的价值,主张研究学术须由博返约,“分之而致其精,合之以观其通”。清季民国时期产生的通史著作,“旨在独裁”,各具特色,吕著中国通史则注重社会的一般状况,并形成了周赡绵密、平实冷峻的撰述风格;吕思勉研撰通史,不仅注意学习借鉴近代的科学知识,而且继承发展了传统史学的方法,凭借着其“通人之学”的学问根柢编撰成多种通贯各时代、博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。

关键词:吕思勉;中国通史;编撰

DOI: 10.16382/j.cnki.10003-5579.2019.01.006

20 世纪初新史学兴起,学界掀起了改造旧史的风潮,加之清季教育体制改革,兴办的各级新式学堂亟须适宜教学的国史教材,于是新式通史的编撰,成了当时史学革新的首要问题。然而在新的学科体制之下,随着分科治学、学术专门化趋势的不断加强,到了二三十年代,通史研撰在总体上日趋边缘、遭到冷落。自 1930 年代中后期起,由于时局剧变,许多学者又对撰写通史产生出了各种新的认识和评价。综论清季民国半个世纪通史编撰起起落落的发展历程,其中不能不提及吕思勉与他所编著的中国通史。1945 年顾颉刚结算新式通史编撰的成绩,认为出版的数量虽然已经不少,但“较近理想的”仅有七部,其中就包括吕思勉的《白话本国史》与《中国通史》两书^①。而据目前统计,除了这两部书,吕思勉还先后编写过十种国史教科书,多为通贯各时代、周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^②。本文将吕著通史置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通史编撰的整体发展过程之中,试从通史编撰与专精研究、治史宗旨与撰述风格、研撰方法与中西之学三个层面进行探讨,冀以展现作者的通史撰述风格,衡量其通史著述的学术价值。

一 通史编撰与专精研究

吕著中国通史当年发行量很大,在学界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。如 1923 年初版的《白话本国史》,据严耕望讲,这部书“内容颇富,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,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,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”,是他曾经认真阅读并深受启发的第一部通史著作,到 1930 年代中期时阅读的人仍然非常多^③。严耕望非常推崇吕思勉的史学成就,把他与陈寅恪、陈垣、钱穆并称近代史学四大家,但若论在民国学术界

【作者简介】李波,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(泰安,271018)。

【基金项目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“吕思勉与民国史学”(项目编号:14YJC770017)。

① 顾颉刚:《当代中国史学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 年,第 81 页。

② 这十种史书,按照初次出版或印制的时间先后,依次为:《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历史教授书》(1916 年),《高等小学校用新法历史参考书》(1920 年),《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(1924 年),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(1934 年),《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》(1935 年),《初中标准教本国史》(1935 年),《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(1937 年),《本国史》(1942 年),《本国史复习大略》(1944 年),《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补充读本》(1946 年)。

③ 《白话本国史》作为较早的一部完整有价值的新式中国通史,当年广受好评。严耕望之外,唐长孺、杨宽等也都自承曾经深受这部书的影响。顾颉刚称此书史识丰富、笔调流畅,“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”;金毓黻认为“此书有系统,有断制,堪称中国史之第一名作,并世作史诸家未能或之先也”。参见顾颉刚:《当代中国史学》,第 81 页;金毓黻:《静晤室日记》,沈阳:辽沈书社,1993 年,第 1470 页。

的声光,吕思勉却不及其他三位。他分析所以出现这种状况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近代史学风尚“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,发挥新意见”,而吕思勉治学风格“属于博赡一途,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”。同时,他又特别强调:“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,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,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,且极不易,或许更难。”^①作为精研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专家,严耕望的这一下对吕氏学术地位“为一般人所低估”原因的评析,就涉及了近代史学界关于通与专、著史与考史的问题。^②

在民国史学界,“考据派”(或“史料派”)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。美国学者邓嗣禹观察到,中国史学界有一派学者“致力于微观专题研究,如一人的死期,一地的勘定,一个术语或专有名词的解释,似乎论文题目越专越好。撰写论文时,作者经常花费很大气力去搜集资料,绕许多复杂的弯路去证明一个细小的问题”^③。当年齐思和即认为,史学界一人包办全史的时代已成为过去,近代以来的史学建立在专精研究之上,“无数的专题论文,在学术杂志中发表,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”^④。关于这方面的讨论,其中最引人瞩目而又持续引发争议的,则是傅斯年的观点。他直接宣称:“历史学不是著史: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,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,作文章家的本事。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,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,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。”在他看来,编撰通史的做法不符合近代科学史学的准则,“我们反对疏通,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,则事实自然显明了”。^⑤

尽管民国史学风尚整体而言偏重仄专研究,但通史的编撰无论是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,还是社会一般的期许,其价值毕竟是不容抹煞的。所以,自新史学兴起以来,运用新观念、新方法编撰适合时代需要的中国通史,始终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重视和倡导^⑥。如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拟成《中国通史略例》,提出建设新史的方案;何炳松于1928年编译《通史新义》一书,倡导运用西方最新的方法编撰通史;等等。而在近代史学界中,号召编撰新史最积极和影响最大的学者,无疑当推梁启超。1901年他写成的《中国史叙论》一文,即是他当时计划中通史的“叙论”部分。此后直到1920年代,梁启超犹认为“新史之作,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”^⑦。对当时史学界已经显现的忽视通史的倾向,他甚为不满,称:“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、辑佚、考古,就是避难趋易,想侥幸成名,我认为是病的形态。真想治中国史,应该大刀阔斧,跟着从前大史学家的作法,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,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,发展的希望。”^⑧此时他仍然在筹划“创造一新史”,并把已撰成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列为该书第一卷暨“治史所持之器”。

对于梁启超等大力倡行研撰通史的做法,齐思和曾经评论:“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述之别,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,结果他自己用了这‘治史所持之器’,并无成绩,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。”^⑨梁启超最后并未能如愿地完成一部中国通史,其间原因种种,大约不止一

① 严耕望:《治史三书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8年,第177—179页。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曾经讲过师从钱穆研读通史、培养通识的学习经历,他们后来虽以研究政治制度史、学术思想史的专家称著于世,但读书治学皆注重讲求贯通和全局观。可见,以“专家之业”名世者,未必不需要具备博赡通贯的学识。这大概就如当年何炳松所论,“通史实即共通之历史”,属于“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不可或缺之部分”,“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,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”。参见何炳松:《通史新义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84页。

② 我国传统史学上的马、班优劣之争就涉及关于通史价值的评价,例如对于司马迁《史记》这部纪传体通史,刘知幾批评“其为体之失者”、“撰录之烦者”,郑樵则称扬“六经之后,唯有此作”。从古代史学的通与断之争到近代的通与专之争,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通史编撰客观存在着的问题与困难。

③ [美]邓嗣禹:《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》(原载美国《远东季刊》1949年2月),李扬眉、周国栋译,《山东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6期。

④⑨ 齐思和:《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》,《燕京社会科学》1949年第2卷。

⑤ 傅斯年:《傅斯年全集》第3卷,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3—10页。

⑥ 若进一步考查,会发现在20世纪上半期史学界很多偏重于专精研究的学者,并非完全认识不到通史研撰的重要价值,而是认为“在专史没有完全弄好以前”,编撰通史“不是件容易事”,难以做到尽善尽美(参见聂崇岐:《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》,《益世报》1946年10月10日)。即便是曾经大力“反对疏通”的傅斯年,在“九一八事变”以后,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也积极从事编撰《东北史纲》,这显然背离了他往常所表现出的对“著史”的态度。

⑦⑧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页;第314页。

端,但判定其“并无成绩,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”,则恐怕还是有些言过其实。关于梁启超的治史方法,吕思勉评价道:“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及《补编》系出自心裁之作,对于史学的意义,自不如外国史学家得科学的辅助者之晶莹,而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。”^①吕思勉在治学上曾深受梁启超的影响,自称“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。粗知学问,实由梁先生牖之,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”^②。吕思勉一方面能够认识到“梁先生的史学,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,或者未能丝丝入扣”;但另一方面又肯定“他那种大刀阔斧,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,总是不容抹煞”^③。“才大工疏,事繁鹜博”的梁启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其通史理想,但其一生中多次制定编撰的方案、目录,若将他所拟定的《中国通史目录》《中国文化史目录》《中学国史教本目录》等,与已经成书的吕著通史的目录内容进行认真对照,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的相同相通之处。如1924年梁启超鉴于当时流行的通史与教科书“全属政治史性质”,“关于社会及文化事项,虽于每朝代之后兼有叙述,然太简略,且不连贯”,提议今后的通史应该:“第一,以文化史代政治史;第二,以纵断史代横断史。”^④无独有偶,吕思勉稍后于1920年代后期写成的《中国社会史》初稿^⑤、1940年初版的《中国通史》上册(该册又名《中国文化史》),即可谓以文化代政治、以纵断代横断的典范之作。而金毓黼则早在1925年读到吕著《白话本国史》之时,就已开始有意识地将梁、吕二人放在一起比较,他讲道:“梁氏之新计划不知何日实现?而吕氏之作已将梁氏所举六部融纳编中,虽体非纵断,而独绝众流,故自可贵,即他日梁氏之作有成,亦恐无以胜乎此耳。”^⑥可以认为,梁启超关于新史编撰的诸多理念和构想,在吕著通史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实践与完善发展。^⑦

早在1921年《整理旧籍之方法》一文中,吕思勉就阐述过关于学术研究通与专的看法,他清楚地认识到近代学术的趋势已经“由混而趋于析”,指出:“近人每好言著中国通史,吾不知其所谓‘通’者,其定义若何?若仍如《通志》之所谓通,吾敢决其必失败,以其与学术进化之趋势相反也。……在今日,唯有从事于将旧时历史中应析出之部分,逐步析出,然后就各部分加以精密之研究而已。”不过,他又特别地强调说:“今后研究学问,固重在分科,但关于全般之知识,亦极关重要。所谓由博返约,实为研究学问之要诀。未博而先言约,则陋而已矣。”^⑧正如昔时章学诚所言“学贵博而能约”,吕思勉虽然充分认识到专精研究的必要,但他同时仍旧看重通史的价值。如上文所述,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,随着学术转型以及新学科体制的确立,“专家之业”取代“通人之学”,史学界普遍崇尚仄而专的研究,注重史料的发掘和考订,相对地,则忽略或轻视对史事的疏通。吕思勉对这种状况无疑是很不以为然的,他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曾表达对当时所谓学界主流“考据派”(或“史料派”)的不满:“今日治新学之人,只知其所治之一门,出此之外,即茫无所知,而发言往往奇缪不可思议,颇为通人所诟病。其实所谓研治国故者,亦何尝不如是。尝见一北大派中人,其人在北大派中读书颇为广泛,而议论亦多窒塞不通,颇以为怪。”^⑨倡行文化形态史观的雷宗海对于这种史学界状况,也发文批评道:“专家的时髦性,可以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。学问分门别类,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以外,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,并非说各门之间,真有深渊

① 吕思勉:《怎样读中国历史》,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530页。

②③⑧ 吕思勉:《辩梁任公〈阴阳五行说之来历〉》《史学上的两条大路》《整理旧籍之方法》,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201页;第585页;第489—490页。

④ 梁启超:《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》,氏著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三十八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9年,第26页。

⑤ 该书曾于1985年以《中国制度史》为书名,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,由于历史原因,此版对原稿作了较大幅度的删改;2007年、2015年该书又先后收入《吕思勉文集》与《吕思勉全集》,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书名恢复为《中国社会史》,内容完全依照作者原稿。

⑥ 金毓黼:《静晤室日记》,第1471页。

⑦ 吕思勉对梁启超史学的继承和发展,不仅表现在外在的治史方法上,还表现在内在的学术精神上。例如,1923年梁启超提出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,一条为文献的学问(“整理国故”),一条为德性的学问(内省和躬行);1941年吕思勉则提出了《史学上的两条大路》,“一条是对治学的人说的,一条是对治事的人说的”。吕、梁二位作为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转型而来的学者,他们做学问不仅“为人”还要“为己”,一方面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,一方面仍然在或自觉或不自觉之地用以立身行事。

⑨ 李永圻、张耕华: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689页。

相隔。”他认为这与当时推行的教育科研体制有很大关系,“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,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,舍本逐末。基本的课程,不是不设,就是敷衍塞责”。当年吕思勉读到雷氏文章之后,对其观点极为赞同,称“雷宗海先生的话,可谓实获我心”。^①

吕思勉在《史籍与史学》一书中谈及今后的“史学演进趋势”,指出:“学问至今日,不但非分科研究不能精,其所取资,并非专门研究者不能解。……然欲洞明社会之所以然,又非偏据一端者所能,则又不得不合专门史而为普通史,分之而致其精,合之以观其通,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向也。”^②吕氏史著可以说即是努力按其“分之而致其精,合之以观其通”的原则编撰而成的。吕思勉治学虽然以博赡著称,但他在专史研究上也下过很深的功夫,不仅发表过大量专题论文,而且撰写了大批专史著作,这些专史包括:社会史一种、民族史两种、文字学四种、文学史四种、通俗史四种、史学与史籍七种、近代史六种、文化史两种、学术思想史五种、政治思想史三种,诚可谓领域广泛、述作宏富。他在诸项专史研究上的成就为其通史研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如黄永年在评述吕思勉后期创作的几部断代通史时所讲:“(他)几乎每个问题每一小点都下过功夫钻研,所以写出来的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东西。如果把这几部书拆散改写成单篇论文,恐怕要数以千计。”^③只是这许多学术创见熔铸在大部头的书中,并不显露罢了。到20世纪末,林甘泉在讨论近代史著时,即认为“傅斯年为了摆脱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固定模式,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‘考史’而不是‘著史’。其实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直接反映编者的历史观点和掌握史料、处理史料的水平。就普及历史知识而言,通史和断代史有专题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。1923年,吕思勉出版《白话本国史》,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,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”,很能够说明“著史”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。^④

二 治史宗旨与撰述风格

中国古代曾经产生过一大批通史家和通史之作,然而在20世纪的新史家看来,传统史书“能铺叙而不能别裁”,“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”,已经落伍于时代的需求。新时代需要以新观念、新方法所写出的史书,1900年章太炎拟成《中国通史略例》,主张新式“《通史》之作,所以审端径隧,决导神思。其他人事浩穰,乐胥好博之士,所欲知者何既,旧史具体,自不厌其浏览”。由此,他提出:“今修通史,旨在独裁,则详略各异。”^⑤新式通史不再如传统史书那样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具体叙述、详细胪列,而是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去把握历史的发展进程,注重对历史脉络的梳理,追求对史事的综括概述。这种“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”的新要求^⑥,当然也更能考验史书作者择取史料、陶镕文辞的学识和能力。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通史编撰的整体情形,大致因应了章太炎最初的创议,各书的作者分别以其所秉持的治史宗旨“取义明志,事次文篇”,使这一时期的通史之作,一方面质量与水平参差不齐,另一方面则个性突出、风格鲜明。^⑦

提倡“今修通史,旨在独裁”,并非作史者可以随意地搬用史事去论证一己之见,更非“其所发的议论,空洞无实,或于史事全未了解,但将理论硬套者”^⑧,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著作必须立足于详实的材料基础之上。正因为此,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被学者视为一项困难的事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通志提要》即论

① 吕思勉:《孤岛青年何以报国》,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360—361页。

②③ 吕思勉:《史籍与史学》《中国史籍读法》,氏著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80—81页;第107页。

④ 黄永年: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(思勉)先生》,吕思勉述、黄永年记: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第6页。

⑤ 林甘泉:《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6年第2期。

⑥ 章太炎:《中国通史略例》,氏著《章太炎全集》(三)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331页。

⑦ 夏曾佑:《中国古代史》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3页。

⑧ 不同学术旨趣和撰述风格的多种史书同时并存,吕思勉是很赞成的,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,读者可以自行选读史书,并相互参证,“而作史者亦得各抒所见;这是于史学大有裨益的”。这些各成一家之言的著作,“其好坏,最好任人评论”;“其信否的程度如何,一以我们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所评定者为断”。参见吕思勉:《历史研究法》,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,第32、33页。

及:“其例综括千古,归一家言;非学问足以该通,文章足以镕铸,则难以成书。”^①吕思勉在1920年拟定《白话本国史序例》时也谈道:“中国历史是很繁的。要想博览,很不容易。”他认为当时已出版的一些通史虽然简略,但又普遍存在两种毛病:“(1)其所谓简,是在全部历史里头,随意摘取几条,并不是真有研究,知道所摘出的事情,都是有关紧要的。(2)措词的时候,随意下笔,不但把自己主观臆入,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;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。”^②此前,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一文中批判旧史弊病时,同样谈到新史编撰所面临的困难,中国数千年历史,史料浩如烟海,“穷年莫殚”,而且“即使有暇日,有耐性,遍读应读之书,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,极高之学识,不能别择某条有用,某条无用,徒枉费时日脑力。”^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,当时就有不少学者提议并且筹划集合多人的力量纂修通史,顾颉刚就提出“最好的办法,是分工合作,先作断代的研究”,在此基础上,进一步“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”^④。分工合作纂修通史的办法,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并不像设想的那么简单,在当年的条件与情势下,这一提议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。^⑤

对于20世纪初以来的新式通史,无论众纂还是独撰,能否经受得起读者的考验,是否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,当年吕思勉曾经不无担心地谈道:“盖通史之作,意在除去(旧史)复重。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,考据之家,一字为实;又欲考史事,宜据原书,新书竞陈,势必舍新而取旧,具兹二义,通史之作,即诚突过前贤,犹或见弃来哲。况乎卷帙过钜,精力虽周,众纂则取消荒芜,独修则贻讥疏漏。安得不如子玄所云今学者宁习本书,愈窥新录邪?”^⑥回顾20世纪初以来一些通史仅仅首版即告绝版,之后便湮没无迹的尴尬命运,吕思勉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。

吕思勉与梁启超所虑,为张荫麟后来撰写《中国史纲》时所重申:“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,细大不捐,应有尽有的写进去。姑勿论一个人,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。即使能如此做,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‘中国史百科全书’,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。”他认为“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”,而“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”。为了写出选材合当、详略得宜的通史,张荫麟在《中国史纲》自序中提出了颇具哲学意味的判别史事重要性的“笔削”标准,并列出了用来统贯“动的历史的繁杂”的数个范畴^⑦。张书运思巧妙、文笔优美,并以“说故事的方式”出之,曾倍受学界肯定。但是,后来也有学者认为,该书的实际内容与自序所设定的目标之间,有着不小的差距,而且作者“整个写作风格,都显得轻灵有余、翔实不足”^⑧。当然,更为令人惋惜的是这部史书仅仅写至东汉,而非一部完整的通史。张书之后,范文澜在编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时同样面临如何处理“丰富而又庞杂的大堆史料”的难题。《简编》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写的通史,作者的做法“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,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,通俗生动的,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,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”。这部书文笔凝练犀利,论述深入浅出,当年很受读者的欢迎。而范文澜本人后来却认识到这部书仍存有两个缺点:“由于片面的‘反封建’和‘以古说今’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”;“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”而造成的“头绪混乱”。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检讨和改进的。^⑨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11册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年,第25—26页。

② 吕思勉:《白话本国史·序例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1页。

③ 梁启超:《新史学》,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九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9年,第6页。

④ 顾颉刚:《当代中国史学》,第85页。

⑤ 梁启超曾指出:“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。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,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,而贯穴乎其间。”(参见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第38页)显然,众人分工合作纂修的通史,各个部分之间往往缺乏深广的关联度,全书难以形成“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,而贯穴乎其间”的那种通识和气脉。

⑥ 吕思勉:《史籍与史学》,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,第56页。

⑦ 张荫麟:《中国史纲·自序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1—9页。

⑧ 王晴佳:《中国史学的科学化—专业化与跨学科》,罗志田编:《20世纪的中国:学术与社会·史学卷》,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2001年,第658页。

⑨ 范文澜:《中国通史简编》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4页、第848—850页。

钱穆是吕思勉的早年弟子,所撰《国史大纲》在近代通史著作中,可谓自成一种风格。他认为“新通史,其最主要之任务,尤在将国史真态,传播于国人之前,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,而油然兴其慨想,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”^①。《国史大纲》成书于抗战期间,主要以士人政治与学术思想两大环节去看中国历史的演进面,进而阐明国家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在,并欲以此精神召唤国魂,所以该书对中国历史文化“阐其精微而弃糟粕于不论,通其大体而置细节于不顾”^②。正是由于这种撰述的宗旨与风格,自从“引论”部分发表后,该书就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,毁誉不一。据钱穆忆讲,在该书正式出版之前,他曾将书稿呈请吕思勉为之校改,并得到了“我师特加赏识”^③。不过,对于钱穆的学术,吕思勉本人还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:“现在的学者中,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象颇有可观;唯觉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,而于社会畸轻,规模微嫌狭隘而已。”^④吕、钱二位皆为近代史学大家,吕思勉的这番褒奖中含有批评的话语,既道出了师生二人学术研究关切层面的不同,也反映出他们在通史编撰宗旨上的歧异。

吕思勉认为,近代史学家的治史宗旨“就是‘再造已往’。何谓再造已往呢?那就是已往的时代,虽然已往了,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,使其时代的情形,大略复见于眼前”^⑤。他认为研究历史就要研究社会的一般情形。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,吕思勉在《中国通史》绪论中谈道:“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。政治的活动,全靠社会做根柢。社会,实在政治的背后,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。不明白社会,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。”^⑥读吕氏史著,会发现其内容确实没有太多的关于所谓政治大事、各类盛事的阐述和议论,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此没有见解,而是在他看来,为人所忽视的普通社会才最值得去关注^⑦。吕思勉认为旧史书的弊病就在于认识不到社会状况的重要,只注重特殊的人物和事件,却不知道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,现在研究史学则需要注重常人与常事,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面变迁发展的,“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,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。不知道风化,当然不会知道山崩。若明白了风化,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”^⑧。吕思勉治史眼光向下,措意民生日用与基层生活,这在吕著通史所设农工商业、财产、钱币、饮食、衣服、住行、婚姻、宗族、阶级等章节内容中能够体现出来。

当年童书业曾经把吕著《中国通史》与钱著《国史大纲》并论,称之为通史界的两部杰作,“吕著长于社会文化的叙述,钱著则长于国史大势的认识”^⑨。而后严耕望比论钱氏与吕氏史著,则称:“钱书才气磅礴,笔力劲悍,有一贯体系,一贯精神,可谓一部近乎‘圆而神’之作;”“吕书周瞻绵密,可谓一部近乎‘方以智’之作”;钱书所长在线索的贯串,吕书所长在材料的详备^⑩。吕思勉治史注重社会状况,凡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悉数摄取论列,但历史上的这类材料不仅数量较少,而且比较零散,搜辑整理颇为不易。吕思勉以一人之力,上迄先秦下至近世,通过对各种材料系统地整理考订,撰成多部通史与断代史,确属不易。诚如严耕望所言:“此种魄力与坚毅,实在令人惊服。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,除了诚之先生,

① 钱穆:《国史大纲·引论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6年,第8页。

② 诵甘:《纪念钱师宾四先生》,无锡县政协编:《钱穆纪念文集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2年,第50页。

③ 钱穆:《八十忆双亲——师友杂忆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5年,第60页。

④ 吕思勉: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》,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406页。

⑤ 吕思勉: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,第25页。

⑥ 吕思勉:《中国通史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2、3页。

⑦ 吕思勉讲过这么一段话:“我则以为人最朴素的,而亦最真实的,是自己的生活的。构成自己的生活的,就是环我而处的人,亦就是社会。所以社会的惨舒,社会上人的苦乐,是最足以激动我的感情,而亦是最足以培养人们的感情的。”吕思勉平时非常关切身周民生日用与民俗风物的情形,曾经辑录了大量的相关资料,可惜这些资料连同他的日记、笔记大部分都损毁于抗战时期。参见吕思勉:《蔡子民论》,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358页。

⑧ 吕思勉:《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315页。

⑨ 童书业:《读钱著国史大纲》,《童书业著作集》第3卷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第738页。

⑩ 严耕望:《治史三书》,第194、195页。

恐怕都难做得到,这不是才学问题,而是才性问题。”^①吕思勉为人不骛声名,恭勤不怠,为文下笔谨慎、忌发空论。吕氏史著行文中多见晓之以理,少有动之以情,这种周赡绵密、平实冷峻的著述风格,大概很难如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那般在学界引发一时的轰动效应。

三 研撰方法与中西之学

1928年光华大学初创历史系,吕思勉担任系主任。在所拟定的课程设置计划书中,他讲道:“吾国史学夙称发达,惟今学问观点不同,一切旧籍均应用新方法整理,而非略知旧时史学门径,否则整理之工作,亦无从施。至于通知外国史事大概,明了现今世变之所由来,进而精研西籍,更求深造,亦今日学者所应有事也。”^②这番对课程设置理念的阐述,无疑也是吕思勉本人治学取向的体现,即不仅要了解传统史学的治学门径,还要精研西方的学术典籍,掌握新的知识和方法。20世纪上半期正值中国新旧史学转型的关键时期,吕著中国通史的研究方法与撰述体制,正反映出在学术转型时代传统和近代的冲突与传承、中学和西学的碰撞与融合。

在研究方法上,吕思勉既注意汲取近代的各种科学知识,又继承了传统的考据之学。他在《白话本国史》绪论中提出“现在研究史学,有两件事情,最应当注意的:其(一),是要有科学的眼光”;“其(二),是要懂得考据之学”。^③其一,“要有科学的眼光”,是主张采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历史,撰写史书。关于治史方法,吕思勉在其《历史研究法》一书中作过系统阐述。他认为现在研究历史,应该特别注意社会学、考古学、地理学、文学(包括训诂、文法等)等学科的知识,并须掌握社会进化、唯物史观等观念^④。在1920年前后撰写《白话本国史》之际,他就已提出用经济学、社会学的眼光研究相关史事,有助于了解社会的发展状况。譬如该书第一篇第九章,就借用了唯物史观来阐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大变迁:“(一)贵贱的阶级破,贫富的阶级起。(二)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,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。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,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。”^⑤1940年前后吕思勉撰成《中国通史》,自称“此书之意,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,多所了解。……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,以资说明”^⑥。该书出版后,童书业对之非常推重,他认为这部通史“尤其不可及的,是他能利用社会科学来探究历史,为中国史学界开辟一条新路径”。^⑦该书对各种社会科学的运用非常充分,例如第一章“婚姻”探究历史上的婚姻状况,就汲取了马林诺夫斯基《两性社会学》、罗维《初民社会》等诸多社会学的研究成果。而且该章中还对现行的夫妇制度、家庭制度等进行了反思和批评,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大胆的观点,即如顾颉刚在评论该书时所说:“叙述中兼有议论,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,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,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。”^⑧

其二,“要懂得考据之学”,是主张采用传统的历史考据学。对此,吕思勉在《白话本国史》绪论中强调:“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,一切书才都可以读,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”^⑨。吕思勉继承了清代学者读书做札记的治学方法,他的多部史著是以读书札记为基础编写成的,以至于严耕望认为其著作“直以札记体裁出之,每节就如一篇札记”^⑩。在吕著通史中,关于史事考据的内容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,书中

① 严耕望:《治史三书》,第179页。对于吕思勉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,当年顾颉刚即非常感佩,他认为吕思勉作为耆年硕学,“孜孜不息,熟诵二十四史,所成著述均极切实”,能够对国史材料做系统全面的整理考订,编撰中国通史“此一大业必须经其草创方有坦途可行”。参见顾颉刚: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》,《顾颉刚全集·宝树园文存卷二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,第256页。

② 李永圻:《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》,上海:上海书店,1992年,第142页。

③⑨ 吕思勉:《白话本国史》,第9页。

④ 吕思勉:《历史研究法》,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,第34—39页。

⑤ 吕思勉:《白话本国史》,第143页。

⑥ 吕思勉:《中国通史·自序》,第1页。

⑦ 童书业:《介绍一部最有价值的中国通史》,载《美商青年月刊》1941年第6期。

⑧ 顾颉刚:《当代中国史学》,第82页。

⑩ 严耕望:《治史三书》,第180页。

“且必著明其如何考据而得,俾学者并可略知考据的方法”^①。金毓黻即称:“近人吕思勉氏之中国通史,系用虫蛀式治史法,著重于分析,如身入大宅之中而细数其所藏。”^②曾有人因而“嫌其太深”,认为吕著通史不够通俗易懂。对此,吕思勉曾在《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例言中谈道:“书中关涉考据的地方很多,似乎太专门了些”,然而“历史是供给各种学问以正确的材料的,其本身的材料不能不正确,无待于言。这是不得已的事。提高学科的程度,其关键全在于此”^③。吕思勉一生治学好讲求考据,他自己曾讲:“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,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,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,都极精深,我都是外行,不敢乱谈,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。”^④可见,在新传入的西学知识与传统的考据学之间,他对于运用后者更加自信。

在编撰体制上,吕思勉通过融会古今中外的史书撰述方法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吕著通史体制。新史学兴起以来的通史编撰,如夏曾佑的《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、章诤的《中华通史》和王桐龄的《中国史》等,皆借用了外国史书依照历史分期编排章节结构的做法。吕思勉前期所编撰的通史,如《白话本国史》、《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等,也是按照分期把全书分为上古、中古、近古、近世、现代五个篇章,依次讲述。这种直接搬用域外史书体制的做法,起初对于新史的编撰与推行,曾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,但后来却不断遭到学者的非议^⑤。自1930年代中后期起,吕思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^⑥。他并不反对研究通史采用分期的方法,但特别强调要依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形划分时期,如他在《先秦史》总论中所讲:“今之治国史者,其分期多用上古、中古、近世、现代等名目,私心颇不谓然。以凡诸称名,意义均贵确实,而此等名目,则其义殊为混淆也。梁任公谓治国史者,或以不分期为善,其说亦未必然。然其分期,当自审史事而为之,并当自立名目,而不必强效他人,则审矣。”^⑦吕思勉在1940年代以后所撰写的几部断代史,即大体上体现了他后期对历史分期的认识。吕著《先秦史》《秦汉史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四部史书,虽然称为断代史,但若将它们放在一起,其实即是一部中国通史的前四分册,或如钱穆《师友杂忆》中所讲,是其全部《国史长编》的几个分编^⑧。这在当年《先秦史》的初版说明中讲得非常清楚:“吕诚之先生以其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史,计划着编著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,按照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阶段分成若干部分,先秦史就是这中国通史中断代的第一部分。”^⑨当时顾颉刚亦曾对人谈及这几部史书:“吕先生《通史稿》积叠已多,如能年出一二册,则五六年可毕。此书一出,邓氏《二千年史》(即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)自然倒坠。”^⑩实际上,五代以后的《宋辽金元史》与《明清史》两部,吕思勉也已作了许多准备,可惜由于身体、环境等原因而未能成书,他计划的这部“理想的中国通史”也就没有全部完成。

① 吕思勉:《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》,第311页。吕思勉希望自己的著作可以做研究国史的“门径之门径、阶梯之阶梯”,所以,吕氏史著中对于引据的材料,均注明了篇名卷次,以方便读者参考使用。

② 金毓黻:《静晤室日记》,第5014页。

③ 吕思勉:《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》,第105—106页。

④ 吕思勉:《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》,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579页。

⑤ 如何炳松反对采用历史分期的方法,他认为:“第一,因为人类的进化,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。第二,因为各期的事业,往往犬牙交错的。历史的分期,完全将我们历史的配景弄错了。”再如日本史家内藤湖南认为,中国仿效其他国家划分时期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,因为中国的文化是独特的,“形成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,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”。参见[美]何炳松:《译者导言》,[美]鲁滨逊:《新史学》,何炳松译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10页;[日]内藤湖南:《中国史通论·绪言》,夏应元等译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,第4、6页。

⑥ 吕思勉所著通史与教科书种数较多,成书时间间距较长,不仅历史分期前后不同,在内容上亦有所差异。例如,在先秦史料的取材上,前期著述侧重今文经学典籍,后期则今、古文经学材料并重;在对史事的看法上,如中国民族起源和宋金和战等问题,后期对前期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修正。

⑦ 吕思勉:《先秦史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3页。

⑧ 钱穆: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,第61页。

⑨ 李永圻:《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》,第216页。

⑩ 沈津:《顾廷龙年谱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128页。

吕思勉后期编撰的史书,放弃了此前按照历史分期编排章节的做法,而是把全书分成“社会文化”与“政治沿革”两大部分。吕氏史著所采用的这种编排方法,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传统史书的内容体制。黄永年称其中“社会文化”部分是一部新《文献通考》,“政治沿革”部分是一部新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^①。吕思勉在《中国通史》绪论中讲:“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·序》,把历史上的事实,分为两大类:一为理乱兴亡,一为典章经制。这种说法,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。”他认为这两大类,“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,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。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”,但是传统史书往往“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,则未免太狭了”。^②鉴于此,吕著《中国通史》把研究的范围“大加扩充”。如“社会文化”部分,包括婚姻、族制、政体、阶级、财产、官制、选举、赋税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货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十八章内容,近乎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,“虽类似正史诸志,而实不同。除政制外,多无所凭借,无所因袭,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,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,皆采正史,拆解其材料,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,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,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”^③。这些内容远非传统的典制体史书所能涵盖,其对传统史书的内容体制可谓既有继承,更有发展。

自清季民国以来,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处于不断衰退的过程之中,以至于后来有学者慨叹:“到了今天,很少有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,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、思想、历史了;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西方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理论才能阐明中国的经典。”^④身处学术转型时代的吕思勉,接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培养,具备丰厚的传统学养,后又积极汲取了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,如徐哲东在评论其学时所言:“群经小学,诸史百家,靡不究贯,亦取异域之说相检度。”^⑤

吕思勉治学领域广泛、规模宏大,新旧兼具、古今贯通,他认同并且实践的是一条由博返约、自专趋通的学术道路,注重学术的积累之功,从基础逐步做起,厚积薄发、博观约取。他凭借“通人之学”的根柢研治史学,重视通史的研究与编撰,先后编撰成多种通贯各时代、周瞻各领域的完整通史,这些史著不仅在20世纪上半期的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,迄今依然不断地翻版重印,并广受推重。这一切,对当下中国通史的研究与编撰应不无启发与借鉴价值。

(责任编辑 孔令琴)

① 黄永年: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(思勉)先生》,吕思勉述、黄永年记: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,第5页。

② 吕思勉:《中国通史》,第6页。

③ 严耕望:《治史三书》,第179页。

④ 余英时:《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》,氏著《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5年,第39页。

⑤ 李永圻、张耕华: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,第703页。吕思勉生平未有人入校求学的经历,其学问基础来自少时身边的父母师友,他曾经回忆说:“当时的风气,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,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,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,这即是当时的所谓‘经济之学’。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。”吕思勉当年所接受的实为中国传统的通才式培养,吕氏史学就是建立在这种“通人之学”的基础上。其实我们不难发现,近代以来,吕思勉、钱穆、陈寅恪、陈垣等有成就的史学家,都是深植于和接续着中国传统学术的,反之,则如唐德刚所言:“有些真能大幅度摆脱传统的学人,却往往由于传统训练不足,而流于浅薄皮相。”参见吕思勉:《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》,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579页;唐德刚:《史学与红学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3页。